

“作为方法的教科书：原理、话语及记忆”研讨会

论点汇编

由浙江大学主办，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浙江大学教科书研究中心、教育部浙江大学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心联合承办的“作为方法的教科书：原理、话语及记忆”研讨会于11月17日、18日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顺利举行。本次会议采用线上线下混合的方式进行，来自国内外高校的59位专家学者作为正式参会代表出席会议，线上线下共180余人参会旁听。现将论坛的有关论点汇编如下：

【开幕式致辞】

顾建民教授，浙江大学教育学院院长：

本次教科书国际论坛是教科书研究领域的一次盛会。教科书作为知识的象征和载体，一直是师生教与学的重要凭借，是落实育人标准的重要载体和促进学生发展的主要依托。一直以来，教科书研究是课程研究关注的焦点。随着核心素养时代课程改革的深入推进，我国当代中小学教材建设步入了一个新阶段，如何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教材体系建设中的作用，已成为当前教育界普遍关注的重点之一。因此，研究现代社会转型时期中小学教科书的意义也就更加突显。教科书的质量直接关系到课程目标的达成，关系到高水平国际化人才的培养，更关系到民族的希望、国家的未来。我们热切期待本次研讨会将教科书作为“方法”进行反思与创造，促进教科书文化的交流与合作、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融合与共享。

高田幸男教授，日本亚洲教育史学会会长：

教科书集中表现国家政策和教育者的理念，学生、读者通过教科书接收新知识、新观念，其国家观念、人生观、世界观等深受其影响，因而，教科书十分值得研究。日本亚洲教育史学会和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和中方教育史专家有二十年来的学术交流情谊，希望通过此次研讨会，开拓国际学术交流的新方式和新途径。

田正平教授，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原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名誉理事长：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和日本亚洲教育史学会有着多年的友好关系。2004 年暮春，浙江大学教育学院与日本亚洲教育史学会曾在杭州金溪山庄共同举办了“教育交流与教育现代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十多年过去了，在此期间，中、日两国的教育史工作者，通过各种形式延续了双方之间的交往和学术上的商榷探讨。当前，世界范围内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从各个方面改变着人类的生活和生存环境。教育领域各种新技术、新方法、新手段的广泛采用，正在有力地推动着教科书编写从理念到实践的深刻变革，站在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的高度，回顾历史，结合各国的实际，总结前人在这方面的得失利弊，探讨关于教科书的原理、方法与书写等问题，不仅是对逝去的历史的一种尊重和重新认知，也是我们教育史从业者以自己的方式对现实的一种积极回应。

周江洪教授，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长：

教科书不仅体现了国家意志与主流价值观念，履行着国家意识形塑与守护的职能，也表征了不同时期教科书编制者的文化传承与创新，是现代教育交流、文化流通与使用的重要载体。不仅如此，教科书编制

的原理与制度更是保障教科书质量，影响一代又一代学习者的学习经验建构的重要支撑。希望通过此次教科书国际论坛的举办，聚焦教科书研究的历史话语与时代发展，加强文化交流、促进教育互动、推进学术繁荣与创新，为教科书研究的原理、话语及记忆注入新的思路与新的力量。

【11月17日大会主旨报告】

主持人：浙江大学教科书研究中心主任刘正伟教授、浙江大学教科书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张文军副教授

田正平教授作《教育大变革中的一位乡村塾师——〈刘绍宽日记〉阅读札记》主旨报告。通过对《刘绍宽日记》的解读，分析了浙江温州一个乡村塾师刘绍宽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教育大变革中形象的转换，考察了在清末民初传统教育向新式教育嬗变中，塾师群体投身于新式教育之后的种种内心矛盾冲突及遭际，指出城乡塾师群体在世纪之交教育大变革中形象转换的普遍社会意义。

日本名古屋大学土屋洋教授从“排日”教科书的史前冲突出发，以小学历史教科书为研究对象，探讨在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国民政府编写的历史教科书所呈现的日本观。首先回顾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教科书政策、日本对“排日”教科书的批判以及卢沟桥事变前后中日关于“排斥、抗日”教科书的争论，接着分析教育部长陈立夫的历史教育观、1942年的历史科课程标准以及教科书编辑者的编写理念，最后对重庆政府时期小学历史教科书的日本观作出归纳总结。重庆政府的历史教科书作为配合抗战所编写的教科书，不言而喻地批评了日本的“侵略”，并强调其计划性，把打倒日本视为国民革命的最终目标。

华东师范大学黄书光教授作了《海派教育家办学的文化审视》主旨报告。黄书光教授以马相伯等为案例分析了 20 世纪海派教育家办学多维度镜像，阐述其致力于学校现代化变革的务实求索历程，及其独特的理论创获和实践诉求。浙江大学刘正伟教授作了《推士与中国科学教育》主旨报告。报告引用大量原始文献，对美国物理教师、物理学教授、教育部教育专员乔治·R·推士的生平进行了详细解读，阐述了推士于 1922 年至 1924 年访华期间参与中国新学制科学课程的设计与改造及其返美之后对中国科学教育的研究与传播。

日本学者向野正弘作了《日本から照射する清末民初**歴史教科書**形成史》主旨报告。作者从清末传入中国的日本历史教科书、教科书的审定制度、中国历史教科书中世界认知的变化、历史教科书内容分析四个方面梳理了清末民初中国历史教科书的形成史。

浙江师范大学楼世洲教授作了《民国时期物理科学教科书研究》的主旨报告。楼世洲教授以《民国新教科书物理学》、《共和国教科书物理学》为案例，对 1927 年至 1937 年的中学物理教材的编写及改革作了细致地分析。

【分论坛（一）】

主 题：“现代教科书的文化：中国与世界”

主持人：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汪辉副教授、叶映华教授

评议人：《复旦学报》陈文彬编审和《上海教育科研》副主编张肇丰研究员

日本爱知教育大学松婷作了《20 世纪初期日本对中国乡土教育产生的影响——以江苏省南通市乡土教科书为中心》的报告，她以江苏省南

通市为区域研究对象，对该地区 20 世纪初出现的乡土教科书《南通县乡土志》的内容进行分析，探讨作为国民教育一部分的乡土教育试图传达出的国民教育理念。

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王亚飞作了《“必远胜于科举制”：张之洞制定清末新学制时对旧学教育的“苦心结构”》的报告，阐释并分析了张之洞在清末新学制构建中的旧学教育愿景，探讨了教育变革中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之间平衡问题。

浙江科技学院黄建滨教授作了《戈鲲化<华质英文>编写理念及其对中华文化教材编写的启示》的报告，从戈鲲化的个人经历与时代背景探析其编写《华质英文》的教育理念以及该教材所体现的教材编写原则。

浙江大学博士生翟瑜佳作作了《时代变迁与国家话语建构：战后中小学课程改革》的报告，重点考察了抗战胜利后中小学课程改革的过程、内容及特点，指出战后中小学课程改革体现了处在时代变迁之际的民族国家建设对教育的诉求。

湖南科技大学李学教授作了《教学视域中的教科书编辑方式创新》的报告，从当代课程与教学视角出发，提出了基于教学的教科书编辑优化策略，实现教科书编辑方式上的创新，并使教科书文本与教学文本之间保持适当张力。

浙江大学博士生水鑫怡作了《抗战时期边区学校课程想象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的报告，从课程想象和民族共同体建构的视角出发，对抗战时期边区学校课程改革进行剖析，指出整风运动后，陕甘宁边区进行

了一场以人民为中心的大众化课程改革，从而开启了一段本土化、地方化教育模式的探索历程。

浙江大学博士生冯小雪作了《竺可桢与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小学地理教学》的报告，考察了竺可桢对于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小学地理教学的改革与实践，指出竺可桢主张中学地理课程混合编制，提出新学制高级中学应把地理列为必修课，以及革新中小学的地理教学法等方面的举措，为中学地理课程的建设及中学地理教学实践做出了重大贡献。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教授李保田作了题为《教材、课本及教科书名称考》的报告，用翔实的史料正本溯源，厘清了教材、课本和教科书之间的概念内涵及其关系。

浙江大学硕士和丽芬作了《三种理论视角下的教材使用研究》的报告，系统地回顾与梳理了国际教材使用研究中三种有代表性的理论，她认为目前教材使用研究趋向理论的多元化和方法的多样化，且不断强调教师、学生和教材之间的互动。

曲阜师范大学硕士付瑞莹作了《鲁教版高中地理必修教科书中的单元活动：设计特点与使用建议》的报告，解析了鲁教版高中地理教科书单元活动设计的特点，并提出相应的教科书使用建议，为地理教师有效使用教科书提供借鉴与思考。

上海杉达学院乔新虹副教授作了《清末〈蒙学生理教科书〉的述评》的报告，阐述了《蒙学生理教科书》体现的“合而为一”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在教材史上具有一定的历史地位和时代价值。

【分论坛（二）】主 题：“现代教科书的教育空间与文化记忆”

主持人：浙江大学教育学院王慧敏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讲师刘幸

评议人：杭州师范大学丁贤勇教授、浙江大学教育学院肖龙海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讲师刘幸作了题为《日本明治时期书法教科书版刻实物考察》的报告，以日本明治时期书法教科书实物为基础，探究日本书法教科书对塑造日本民众书法审美认知的作用及影响。

日本明海大学准教授小川唯作了《经亨颐与日本——探讨清末留日学生回国后的地方教育改革》的报告，探讨经亨颐于 1903 年至 1911 年自日本东京留学归国后所带回来的伦理学、课外活动、社会教育等教育思想对浙江新式教育产生的影响。

山东泰山学院讲师王荣辰作题为《日本作文法教科书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以夏丏尊“教学小品文”理论为例》的报告，详细介绍了夏丏尊译介日本“教学小品文”及其在中国的接受与本土化过程，以及对小品文作文练习价值的改造。

韩国学中央研究院博士生李彬彬作了题为《清末民国时期地理教科书中韩国形象的变迁》的报告，介绍了在清末民国时期中国地理教科书中，韩国从“小中华”向“落后国”最终转变为“同伴者”形象的变迁过程。

杭州高级中学教师余知辛作了题为《清末民国时期浙江省立第一师范美术课程研究》的报告，作者在报告中考述了清末民国时期浙江省立第一师范的美术教学理念、课程设置以及教学方法。

华南师范大学博士后闫斐作了题为《国家认同的演变与重构：建国以来初中历史课本中少数民族形象的演变》的报告，以新中国建国以来不同时期出版的初中历史课本中少数民族形象的变化为例，探讨我国国

家认同教育中的“多样性”议题，指出我国的国家认同具有变化性及时代性等特征。

浙江大学肖龙海教授和叶德伟作了《教科书上的“非典”——科学课程中的防疫教育》的报告，选择了若干版本科学（生物）教科书，从编写依据、教学内容、教学目标和教学方法四个方面检讨中小学科学教科书上的“非典”学习内容，审视当前的科学防疫教育。

浙江大学王慧敏副教授作了题为《国家性格、文化独立与语言教科书——诺亚·韦伯斯特论共和国教育中的国家主义》的报告，通过分析韦伯斯特的语言教育与政治思考之间的关联，并将其置于美国建国初期的时代背景中进行考察，阐述了美利坚合众国在获得政治独立之初所面对的追求文化独立的急切、焦虑和不安全感。

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后蒋佳作作了题为《Desiring Responsible Socialist Citizens: The Representations of Citizenship in the Official Textbook of the Politics Curriculum in China》的报告，她通过对公民教育中某些特定话语的特征、起源、目的、局限及其产生的社会政治和历史背景进行分析，以高中政治教科书为研究对象，考察话语建构之下的公民形象，指出教材里的民族认同背后有对政治认同的培养。

西北大学硕士王子聪通过考察民初历史教科书接受和改造“文明”与“进化”的观念的历程，探讨了编纂教科书的知识人心中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与不断扩张的帝国主义之间关系的变化。

浙江大学硕士刘密佳作作了《〈纽伯特报告〉与现代英语学科的形成》的报告，比较深入地梳理了《纽伯特报告》产生的背景、内容及特点，指出其对英语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分论坛（三）】

主 题：“现代教科书的编制原理、制度及创造”

主持人：由浙江大学教育学院何珊云副教授、“百人计划”研究员刘超

评议人：山西省社会科学院《晋阳学刊》副研究员李卫民和湖南科技大学李学教授

浙江大学“百人计划”研究员刘超作了题为《近代中国大学的制度、运作与构型——以年龄结构为例》的报告，作者分析了 20 世纪初期近代中国大学出现的少壮派教授和年岁颇大的讲师并存的怪现状，指出了当时学术制度的结构性缺陷。

德国 Georg Eckert 国际教科书研究所博士生李凯一作了题为《国际联盟作为国际共识的载体是可能的吗——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教授国际联盟知识的全球化尝试》的报告，以国际知识合作组织的历年会议报告以及该组织出版的教育期刊为文本材料，从跨国史的视角及新制度主义原理来论证国家立场是如何影响教科书中对国际联盟的描述。

浙江大学博士生陈金慧作了《抗战时期国立大学招生联考研究》的报告，对抗战时期国立大学招生联考制度变迁进行系统的考察与梳理，指出抗战时期国立各院校根据战时实际需要和各区域特点，先后采取联合、分区、再联合招考的多次尝试，最终走向国立各院校统一招生。

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博士生余龙作了题为《晚近教材应用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嬗变——以商业性知识为中心》的报告，分析了晚近学校正规教育中商业教材的使用对于个人商业需要之作用，阐述了 20 世纪 20 年代以前“实用救国浪潮”的意义。

云南师范大学张睦楚副教授作了题为《想象异域与自我正名：留美中国学生及其游学指南手册中的留学生活》的报告，对近代留学指导类手册的留学生活进行检视，从留学生与近代异质文化互动变迁关系的视角入手，挖掘与留学生相关的文本所留下的“文化互动”的印记。

浙江大学博士生王林卉作了《回到象牙塔：1930年代中央大学对大学精神的想象及建构——以〈国风〉为中心的考察》的报告。她在报告中研究指出，在1930年代初，以南高师学者为主的学者群体在《国风》杂志中呼吁学者回到象牙塔，保持学者人格，坚持学术独立，并据此建构了一幅理想大学教育的图景。

浙江大学博士生谷亚作了《抗战时期国立大学研究生教育——以浙江大学为中心的考察》的报告，以国立浙江大学作为个案，探讨了抗战时期国立浙江大学在研究生招生、培养和毕业考核中形成的文理交融，多科并重；研究与应用结合，服务国家与社会需要；理论研究与实践相结合等特点。

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任睿在《民国时期教科书助读系统的演变与启示——以中学国文科为例》的报告中，梳理了民国初年、新学制时期、新标准时期以及全面抗战时期中学国文教科书的样态变化，揭示了助读系统从单一零散到多点分布再到系统整合的发展变迁过程。

浙江工商大学张绪忠副教授作了《历史书写与民族认同：抗战时期历史教科书中民族主义话语的表达》的报告。报告指出，民族主义始终贯穿在历史教科书的编写中，抗战时期历史教科书的编写更加关注文化的传承和民族振兴，呈现出较为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

杭州师范大学讲师饶鼎新作了题为《从“法式”到“法则”：1930年代中学国文教科书文章作法知识的建构》的报告，分析在1930年代被写入中学国文课程标准中的“文章作文法”教学，阐述了其对中学国文教科书知识体系现代转型的促进作用。

浙江外国语学院讲师祁小荣作了题为《语文教科书视角下写作教学知识谱系与话语变迁》的报告，该报告总结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写作教学知识中的“阐释共同体”、“共同范式”、“常规话语”三重话语，梳理了在修辞学视阈之下写作教学话语类型的形成过程，并以美国写作教材《写作者的选择》中的四种体裁类型为例，解析语文教科书视角之下的写作教学话语实践。

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张悦、高德胜教授作了《初中<道德与法治>教材中国家形象的社会表征研究》的报告。报告基于4D国家形象模型和社会表征理论，采用两种方法来分析初中《道德与法治》教材所建构的国家形象，指出国家形象是特定历史时空下的国家现实的反映，是国家意识的直观表达，并印证了教材在传递国家叙事中所起的作用。

浙江树人大学讲师陶芳铭作了《我国中小学德育教科书百年历史演进及价值嬗变》的报告，在梳理百余年来中小学德育教科书演变的历史轨迹的基础上，评述了我国中小学德育教科书文本中所蕴含的“变”与“不变”的价值教育理念。

【11月18日主旨报告】

主持人：浙江大学教科书中心副主任屠莉娅副教授、教育部浙江大学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心副主任刘徽副教授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课程与教学部主席 Daniel Sergio Friedrich 副教授作了题为《Historicizing Curricular Struggles: Global and Local Issues》的报告，他借鉴了美国教育史学研究的基础性文本《1893~1958 年的美国课程斗争》（克利伯德著）一书中的史学思想及概念工具，通过审视克利伯德关于课程与知识问题的阐述与当今的区别及联系，以及不同的利益群体之间全球性和本土性的问题，探讨了当今课程与知识建构应有的框架。

日本东京大学教育研究生院福留东土教授作了《Undergraduate Education in Japan and the U.S.: 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Reflections》的报告，从历史的角度对美国和日本的本科生教育进行了比较。福留教授研究指出，二战后从美国引入的通识教育课程在日本效果并不显著。他强调，应从历史实践进行反思，不断寻找本国本科教育的新途径，从而更好地培养作为全球领袖的年轻一代。

西南大学谢长法教授作了题为《道尔顿制的“中国之旅”——以柏克赫斯特 1925 年在华活动为中心》的报告，作者通过对柏克赫斯特访华前的准备、柏克赫斯特在华的行程梳理与分析，清晰地呈现出道尔顿制完整的“中国之旅”及其影响。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商丽浩教授作了《民国中学外国地理教科书中的日本》的报告，从形塑世界观念的角度，阐述了民国时期中学外国地理教科书中呈现日本形象的三个维度，指出其内容变迁体现了国人对日本丰富而复杂的认知，也记录了国人世界观念变化的轨迹。

韩国韩南大学的李相武副教授作了《朝鲜时代饥荒和传染病的发生时学校和科举制的运营——以 17 世纪小冰期为中心》的报告，将历史与现实问题进行隔空对话，论述了 17 世纪朝鲜饥荒和传染病对学校 and 科举制的影响，指出当今新冠疫情肆虐，教育情况与 17 世纪因饥荒和传染病

而延期上学等活动有很大的相似性，引发了历史事实如何关照现实、为现实服务的思考。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屠利娅副教授作了《教科书中民族精神的多重演绎：基于民国小学公民教科书的分析》的报告。报告以民国三种公民教科书为案例，从知识建构、内容体裁和编撰特点三个角度细致地探讨了中华民族精神在公民教科书中的表征和演绎的多样化形态，并以民国教科书为棱镜来审视民国时期民族精神意义建构的内涵。**【闭幕式总结】**

刘正伟教授，浙江大学教科书研究中心主任：

2020年反复出没的疫情未能阻挡各位专家参与学术交流的热忱，本次会议跨越国界、跨越时空、跨越学科边界，研讨涉及课程理论、教育实践和教科书历史等领域，打通了教科书研究的历史、现实和未来的视界，使“作为方法的教科书：原理、话语及记忆”呈现一个丰富而立体的世界。

浙江大学教科书研究中心文/和丽芬、

刘密佳、陈恬妮编辑/苏洁